

[德] 玛丽安妮·韦伯 著

Max Weber:
A Biography

马克斯·韦伯传



商务印书馆

马克斯·韦伯传

〔德〕玛丽安妮·韦伯 著
阎克文 王利平 姚中秋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斯·韦伯传/[德]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5950-3

I. 马… II. ①韦… ②阎… III. 韦伯(1864~
1920)-生平事迹 IV. K9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3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著
阎克文 王利平 姚中秋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950-3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58 1/4 插页8
定价:105.00元

译者前言

在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当中，像马基雅维里、卡尔·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的地位至今仍然无可争议。不过与众不同的是，韦伯思想体系的“效力”始终没有受到过足以使其发生根本动摇的挑战，即使在非西方社会中也是如此，比如在我们的语境中，长期以来，主流文化就根本没有挑战过韦伯的思想，只不过，它的表现是干脆无视韦伯及其思想的存在。当然，最近十多年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韦伯研究正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说明了关心中国社会与文化前途的人们已经无法回避韦伯思想历久弥新的渗透力。职是之故，译出这部《马克斯·韦伯传》呈献给中文读者，亦可谓恰逢其时了。

这部传记在韦伯辞世六年后的1926年问世，立刻便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传记作者是现代德国第一代著名女性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之一，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不言而喻，韦伯身后留给世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这部传记有关，因此，本书的独特地位至今仍无出其右。在作者笔下，衬托着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宏大背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韦伯主要是一位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英雄和伟人，一位理应实际影响历史进程的潜在的民族领袖，一位饱经身心磨难的现世的普罗米修斯，他的学者风范和学术成就反居其次了，这与我们一般了解的韦伯是颇有些出入的，或者换句话说，这让我

们看到了更完整的韦伯。

蒙刘军宁、冯克利两位学兄鼓励,笔者约请王利平女士和姚中秋先生一起,勉力译出了这部皇皇大传。遗憾的是译者均不谙德文,只有从英译本移译。好在这个英译本出自已故著名翻译家、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德语和斯拉夫语系主任、德国荣誉教授 Harry Zohn 之手,权威性为欧美学界所公认,这使中译者多少感到有些“有恃无恐”,唯愿竭力忠实于英译,祈能不负作者和读者。

译稿的分工,依次为阎克文执笔导读、第 1—13 章及韦伯年表,王利平执笔第 14—16 章,姚中秋执笔第 17—21 章。为统一行文风格和体例,笔者对全书做了通校,并将原书的索引按照汉语拼音音序重新编排为人名索引译出,以便读者对照检索。另外,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作注几乎到了惜墨如金的程度,大量注释均系德文原著的编者所加。为中文读者着想,中译者又增加了部分译注,自然也是应尽的义务。

阎克文谨识

2008 年 4 月 10 日

作者卷首语

马克斯·韦伯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使这部传记得以利用了韦伯写给他们的函件。只有把这些函件中的大量信息融入叙述过程，才有可能使韦伯在本书中现身说法，并展示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与政治运动所作出的反应和产生的影响。本书作者理应感谢他们各位，特别是那些在与韦伯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收到韦伯来信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不仅没有拒绝提供这些信函，而且允许发表其中的部分内容。有些朋友给予的直接关注和建议，使本书作者得到了极为宝贵的帮助和鼓励，令作者尤为感激。

导读：

玛丽安妮·韦伯及其圈子

京特·罗特

（本文直接或间接引语后面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这部传记的页码，数字前面标有L者为玛丽安妮·韦伯的自传 *Lebenserinnerungen* [Bremen: Storm, 1948]页码）

在玛丽安妮·韦伯(1870—1954)开始编辑她丈夫20世纪20年代之初遗下的大量文献时，秉持一种社会“有机”论、曾经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家奥特马尔·施潘(1878—1950)声称，马克斯·韦伯是“一位走火入魔、躁动不安的人物，他能够通过人格力量影响他人，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毕生从事的工作在他身后能够历久长新。……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学科已经过时”^①。判断之谬，几可谓莫此为甚。事实证明，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至今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唯一一位在谢世之后许多年间都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人物。

在生前，韦伯仅仅是众多杰出学者中的一员，他的声音能否在喧闹的论战中脱颖而出并且传诸未来，还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① Othmar Spann, “Bemerkungen über Max Weber,” *Tote und lebendige Wissenschaft* (Jena: Fischer, 1925), sec. ed., p. 140; 重印于 *Gesamtausgabe*, W. Heinrich et al., eds. (Graz: Akademische Druckanstalt, 1969) vol. 7, p. 200。

我们喜欢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因其成就的内在质量而比他们的时代更加长寿,但是,他们那些被人夸耀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自己能否接受以及如何定位。而且,公正地说,如果不是玛丽安妮·韦伯,她丈夫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获得后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最后,她对韦伯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并无兴趣,传记中只有不多的篇幅谈到这个话题。但是,她相信韦伯是个伟人,一个伟大的学者,对此她从不犹豫。在结束了编辑工作并写完传记之后,她在1926年给保罗·霍尼希斯海姆(1885—1967)写信说:“在我看来,韦伯的声誉只是刚刚开篇。人们在得到他的著作(10—12卷)时将会目瞪口呆的。我的生活就是为了使他永世长存。”^①事实上,在韦伯生前与身后,她为之生活的东西要多得多,尽管她和她的“伴侣”体现、记录和保存了她的生活的基本内容。

传记风格:贤妻与孝女

如今,玛丽安妮·韦伯已被看作是一位名人之妻,而且称得上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在她的韦伯传中,她着力把自己描绘成了丈夫身边的女杰。不过,尽管她大量展示了——这使许多最早的读者深感震惊——他们充满烦恼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乱世景象,但是如果我们事先问一下,伏在丈夫的书桌上写出了这样一部皇皇传记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妻子和男女平等主义者,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故事。

长期以来,妇女们以写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的精神历程和整

^① 引自 Eduard Baumgarten, ed., *Max Weber. Werk und Person* (Tübingen: Mohr, 1964), p. 605.

理供私人传阅的家族史。现在，她们要发表自己的作品了。玛丽安妮·韦伯的家族与学术圈子中有许多男女给我们留下了传记或自传。它们是这类书面语体的极品。有些这类传记——它们常常大量依靠书信——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夸张做作和感情用事。然而，它们却探讨了一些仍与当下思想和政治形势有关的令人头疼的道德问题，而这时自由主义尚处于守势，一场针对反正统文化的反革命则在不断升温。玛丽安妮·韦伯和她的大多数自由派政界朋友都是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代言人，这在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义文献中仍能得到响应。不过，她的几位密友也曾在理论和实践中采用过一如性解放的道德观那样的“新伦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正统文化已经借助许多主题登台亮相，它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又得以旧调重弹。

韦伯夫妇作出了艰难的尝试以克服道德上的自相矛盾和人际之间相互施加的压力，并在关键时刻发现，精神与肉体的和谐是难以企及的。玛丽安妮最为关切的是男人和女人如何才能过上道德的生活，并对他们的“伴侣”——她最喜欢用这个说法称呼她与丈夫的关系——特别是对下一代承担责任。她的婚姻并不圆满，而且没有子女，但她仍然担起了促进婚姻与两性关系改革的全部重任，以一些有时会伤害我们感情的方式成了其他人的未婚母亲。不过毫无疑问，她在思想与私人事务上是有着高度的道德严肃性的。虽然玛丽安妮的世界观从激进的妇女解放角度来看似乎极为反动，但在妇女运动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人们可能会重新比较严肃地看待她曾尝试加以解决的某些问题。

1920 年马克斯·韦伯去世，玛丽安妮·韦伯时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这是一个处在庞大的妇女组织网络环绕中的最令人尊敬的地位。但是和她的一些朋友不同，无论在妇女运动的内部还是外

部,她从来就不是个政治强人。她的任职是由于她的学者声望,是在男性世界面前证明一种精神上的责任和道德上的高尚。玛丽安妮属于跻身大学而学有所成的第一代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巴登、普鲁士先后准许授予女性学位之前,不得不前往瑞士就学。

直到1908年,对于正规学习以及所有政治活动的正式屏障才得以撤除,但是许多障碍依然如故。在德意志帝国没有女性教授;在帝国崩溃之前,妇女根本得不到联邦或邦这一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玛丽安妮·韦伯在学术环境里扮演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这个环境第一次让男女教授共同开始了真正的思想交流。人们至今没有放弃这样的环境,但是,她为平等的思想与政治参与而进行的斗争还远没有取得胜利。妇女在德国教授和德国议员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之低,毫无疑问低于美国,在那里,玛丽安妮·韦伯如今可能会成为一个道德哲学教授,一个汉娜·阿伦特或者一个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勃,也会为“学术交际”(academic sociability)——1920年代以来她在海德堡的圈子名称——而奔忙。

在韦伯那一代人留下的大部头传记文献中,她和其他若干人的著作都属于贤妻和孝女型的作品。和玛丽安妮一样,阿格内斯·冯·察恩-哈纳克(1884—1950),一位孝女,也是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文学代表——一个今人难以置信的角色组合。这些女性中有几位乃是一些强势人物的女儿或妻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妇女运动一般都是采用谨慎改革的路线,而不是进行公开的挑战,以便持续获得男人给予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支持。

玛利亚·冯·邦森(1862—1941)早在1900年就描绘出了一幅“失败者阵营中的性格肖像”——这是她记述被俾斯麦制服了的自由主义者之一格奥尔格·冯·邦森时的副标题。1922年,玛格丽特·明斯特伯格(1889—1958)着力给韦伯的前弗赖堡同事和朋

友胡戈·明斯特伯格(1863—1916)恢复了名誉,他是一次大战期间哈佛大学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德意志帝国声名狼藉的事业的孤独斗士。以上都是恪尽孝道之作。相比之下,格蕾特·奥斯瓦尔德是给韦伯的对头之一、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古怪而亢进的“一元论”哲学家威廉·奥斯瓦尔德(1853—1932)大唱赞歌。阿格内斯·冯·察恩-哈纳克则以庄严的语调讲述了阿道夫·冯·哈纳克(1851—1930)的业绩,这是一位专攻早期基督教史的著名学者,也是德国的第一位“科学大王”,曾任“凯泽·威廉学会”(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长。这些做女儿的全都慎言自己父亲的私生活,尽量不让它们引人注目。我认为,玛丽安妮·韦伯本人则是以贤妻的路数开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的做法。她的朋友玛丽·路易丝·格特恩(1863—1931)就是以她为例给埃尔哈德·格特恩(1853—1923)作传的,“夫唱妇和”而又把自己隐在幕后。尤丽叶·布劳恩-福格尔斯泰因(1883—1971)则是抱着政治目的在1932年发表了一部言辞审慎的海因里希·布劳恩(1854—1927)传记,这位社会主义作家是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的前任编辑;几周之后纳粹上台,尤丽叶的书和日记被禁。^①

① Marie von Bunsen, *Georg von Bunsen. Ein Charakterbild aus dem Lager der Besiegten gezeichnet von seiner Tochter* (Berlin: Hertz, 1900); Margaret Münsterberg, *Hugo Münsterberg* (New York: Appleton, 1922); Grete Ostwald, *Wilhelm Ostwald. Mein Vater* (Stuttgart: Berliner Union, 1952); Agnes von Zahn-Harnack, *Adolf von Harnack* (Berlin: Bott, 1936), 1951年再版; 另见他的 *Die Frauenbewegung. Geschichte, Probleme, Ziele*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1928); Marie Luise Gothein, *Eberhard Gothein. Ein Lebensbild, seinen Briefen nacherzählt*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1); Julie Braun-Vogelstein, *Ein Menschenleben. Heinrich Braun und sein Schicksal* (Tübingen: Wunderlich, 1932); repr. as *Heinrich Braun. Ein Leben für den Sozialismus*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另见他的 *Was niemals stirbt. Gestalten und Erinnerunge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与阿格内斯·冯·察恩-哈纳克和格雷特·奥斯瓦尔德不同，玛丽安妮·韦伯不可能讲述一部高歌凯旋的学术成就史；她更类似于邦森和明斯特伯格，试图唤起人们对一个政治与学术局外人的同情。她的做法是把这位英雄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的创造力而付出的痛苦努力，同一个家族的代际冲突史、一些夫妻间的紧张关系、疾病和死亡结合起来。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看到了一个傲慢的男人由盛而衰，又在一位女英雄的慷慨帮助下重新获得了创造性力量和政治热情。但是，就在他能够“像30年前那样工作”（韦伯临终前留下的短语）时，残酷的命运夺去了他的生命。如此引导读者注意家族和代际冲突，表明玛丽安妮·韦伯不仅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的贤妻，而且是作为一个追求性解放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在写作。^①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本书会有三个中心人物：委曲求全的母亲海伦妮（1844—1919），倔强而富有关切之心的儿子，以及后来成为儿子发妻的一位养女。实际上，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玛丽安妮给海伦妮的书信谋篇的，这是一位既权威又充满了慈爱的真正的母亲。不过，故事并不完整。除了这个强有力的精神三角之外，还有至少两个三角关系。玛丽安妮只是约略提到了她可能从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一个三角关系：她本人，马克斯，以及埃尔泽·贾菲-冯·李希特霍芬（1874—1973），这是她所喜爱的“姐妹般的朋友”，也是马克斯生命晚期的情人。玛丽安妮对于另一个三角关系也没说什么：马克斯、阿尔弗雷德·韦伯（1868—1958）与埃尔

^① 然而，玛丽安妮·韦伯对于简·亚当斯、海伦妮·兰格等等独身的女权运动领袖所作的相当坦率的比较，也并没有揭示出其他女性的多少生活内容。她们集中关心的是事业和运动，想要对她们的斗争作出一种非个人的叙述。见 Helene Lange, *Lebenserinnerungen* (Berlin: Herbig, 1927)。

泽,两兄弟为了博取她的青睐而进行过长期的竞争。最后,海伦妮和玛丽安妮,玛丽安妮和埃尔泽,这些女性的休戚与共也影响到其他几位女性,她们战胜了道德上的困窘和意志的脆弱,形成了毕生的忠诚友谊。

在以下各节,我将在玛丽安妮·韦伯半个多世纪以来其他作品的背景下谈论这部传记,并且确定一下作者及其圈子在她那个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中所处的地位。这包括她比她丈夫多活的那34年。

1914年之前德国男女平等主义的矛盾倾向

为性别平等而不懈斗争

韦伯是怀着一种要求平等的自觉意识开始他的婚姻的,这显然是对他父亲的家长统治发出的抗议。虽然年轻时的韦伯还对最早有些女学生的男子气举止抱有一种矛盾态度,但是,玛丽安妮有力地指出,他也曾明确地说过,“女性的内心自由和独立,即使对于已婚妇女来说,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与男人的权利都是完全平等的”(131)。然而,这种良好意愿却遇到了社会与心理上的障碍。法律明确要求妇女和儿童要遵从丈夫。韦伯本人在尝试秉持一种新的姿态时就表现得很不老练。1893年秋天结婚前不久,29岁的男人向23岁的女子保证:“我的孩子,我们将自由而平等地站在一起。”(214)差不多50岁的时候,在晚期的一封信中,马克斯仍然按照习惯的爱称叫玛丽安妮“我亲爱的孩子”^①。

玛丽安妮曾经冷嘲热讽地指出,一般来说,婚姻关系一吃紧,

^① 见前引鲍姆加登著作, p. 635。

男人往往就会以恼怒的低声使用那个短语(L 91)。玛丽安妮 42 岁时,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从奥林匹斯山给她写来的信中还把她称作“我的孩子”(527),而这时她已是国内最有名气的女学者之一了。她曾利用身为教员妻子的社会地位,大着胆子去听丈夫的弗赖堡同事(特别是阿洛伊斯·里尔和海因里希·里克特)的讲课与研讨班。30 岁时,她发表了第一项研究成果,这对于一个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中等教育、只是到了快 20 岁时才读了两年寄宿学校的女性来说,堪称一大成就。然而,和她的朋友们相比,她并没有正式获得什么学位,因而没有成为一个凭自身能力而不是靠派生身份的“女博士”;直到 1924 年,她才被海德堡大学根据法律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玛丽安妮的第一本书《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费希特的社会主义》发表于 1900 年。它是抱着哲学关切写给经济学家们的,并且探讨了约翰·戈特里布·费希特(1762—1814)与马克思的终极道德假设,这预示着伴随她一生的将主要是一般的道德关切,而非具体的男女平等主义。这部专著被收入了马克斯·韦伯与人合编的经济学丛书,他认为应当说明的是,“除了一些要点得到认同,以及很少的文字和术语提示之外,作者不得不在每一个方面独辟蹊径,几乎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她的其他导师通常所给予的那种学术建议。”^①

应当记住,身为教授的德国丈夫发表他妻子的研究成果,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次。虽然马克斯坦言相告,但是玛丽安妮却欲言又止。她在该书前言中说道,她的著作“只能在空闲时间里慢慢写,而且还有许多干扰”,小心地暗示了她丈夫令人气馁的抱病之

^① 见 Marianne Weber, *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r Marx'schen Doktrin* (Tübingen: Mohr, 1900) p. VI.

身,这在本书中有着生动的叙述。如果说韦伯的疾病对他自己而言是在“坠向地狱”(270),那么对于玛丽安妮来说同样如此,不过她并非完全无计可施。她是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使她变得更加坚强。母亲一生下她就死在了产床上,父亲(和一位叔叔)得了精神病,她面对的是严酷的生活现实,伴随她成长的是死亡和疾病的气氛,她在自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讲述了这段经历。她对自己的遗传负担也是忧心忡忡,但是她以清醒的头脑面对了丈夫的沉痾,她要 and 这个世界进行较量,而不是从它面前退缩。然而,至关重要,她对婚姻的道德责任坚定不移,并且怀着一种与任何“发现自我”、“实现个人潜能”的享乐主义追求针锋相对的自我实现观念,这些都使她勇气倍增。

晚年回首往事时,玛丽安妮讲述了当时对自己生活的利弊权衡:“生活给我提供了许多实现自我的机会,我求学若渴,乐此不疲,而且还能兼顾公共活动。……马克斯·韦伯也对我在妇女运动中的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且,无论出现什么困难,他都会提供豪爽的帮助。……我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都是那么充实,因此,在生儿育女方面没有给那些不切实际的希望留出余地。正是这种充实感,给了我力量帮助马克斯·韦伯——我的生活目标——忍受并战胜了持续多年的严重神经官能症的折磨。”(L 56)

回过头来看看,奠定了玛丽安妮学术声望的《法律演进过程中的妻子与母亲》一书,其自传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① 该书写于“(我)丈夫病重期间,而且得到了他的指导,付出了七年的努力之后,我设法完成了它”(L 124)。就是说,把海伦妮夹在中间的马克

^① Marianne Weber, *Ehefrau und Mutter in der Rechtsentwicklung. Eine Einführung* (Tübingen: Mohr, 1907), repr., Allen: Scientia Verlag, 1971.

斯·韦伯父子于1897年在海德堡最终摊牌两三年之后,这部著作才开始动笔。这场对抗以父亲的去世和儿子的崩溃告终(详见本书第八章)。玛丽安妮坦言,对于这部著作,她的丈夫不仅提出了写作规划,而且给予了详尽的建议,并在最后校订时伸出了有力的援手(L. Vf.). 毫无疑问,这使它成了韦伯夫妇同声相应的产物。

这项冗长的历史研究,旨在引导妇女和男人们不要在乎有关妇女地位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而应关心它的实践意义。韦伯后来在《经济与社会》“论法律”的一章中也采用了这一社会学方法。但是,和《经济与社会》不同,《法律演进过程中的妻子与母亲》并非心平气和之作。玛丽安妮的书是献给“衷心敬爱的海伦妮·韦伯·内·法伦斯坦”的,里面对于父权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强烈呼吁在婚姻关系中实现性别平等。然而,除了与家族事务有关的动机之外,我们也不应忘记,玛丽安妮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新的民法典刚刚颁行的1900年。新法典遭到了妇女运动的反对,因为它几乎完整保留了丈夫的特权,尽管它也勉强承认了妇女的有限法律地位。

玛丽安妮在对父权统治发动攻击之前,也批评了巴霍芬和恩格斯的母权制理论,并试图勾画一下合乎历史实际的现代婚姻“发展史”。她同意,家庭中的父权统治并非天生就有,但她认为,私有财产的发展产生了父权制婚姻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她看来,合法婚姻乃是长期发展的产物:“妇女关心的是让她们孩子被承认为男人的‘合法’后代,从而也让她们自身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防止绝对的随意性。终于,这种关心变得足够强烈,从而迫使父权统治作出了让步。”^①她还用韦伯式的

^① Marianne Weber, *Ehefrau und Mutter in der Rechtsentwicklung. Eine Einführung* (Tübingen: Mohr, 1907), repr. Allen: Scientia Verlag, 1971, p. 79.

语调辩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乐于剥削妇女的廉价劳动,但这并不会形成特定社会的或者法定的婚姻形态,相反,它们对婚姻形态相当漠然。

玛丽安妮·韦伯最为雄辩的那些内容,既是对老马克思与海伦妮婚姻失败的直率记录,也可以看作是对德国法律和德国丈夫的全面控诉。她从许多方面铺陈了丈夫为什么压制妻子要求外在与内在独立的任何企图。针对这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她提出了建立在平等主义基础上的伦理个人主义和相互承担责任的观念:“概括一下对于妇女和婚姻生活来说必定会产生的普遍的伦理与心理后果,我们应当再次申明我们为什么反对孕育了婚姻法的父权主义观念,虽然丈夫确实对妻子的人身和财产行使着法定权威,因而使他的支配地位成为理所当然,但这往往毫无费希特所要求的那种高尚味道。……(从属地位)不仅有损妇女的幸福,而且有损夫妻关系的伦理价值。……如果按照官方原则,让丈夫的主观愿望成为法则,他就不会有什么通过‘自由恋爱’得到的妻子。无私的相互教育正在日渐消失,所有那些使婚姻生活历久长新、使人对它感到心满意足的内在任务如果遇到挑战,可能都会被认为理所当然。”^①

法德两国教育体制的两位奠基人物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和弗里德里希·鲍尔森(1846—1908),对玛丽安妮的书作出了激烈反应,表明尽管她相当温和也仍然遇到了阻力。涂尔干称赞了玛丽安妮在把握间接文献时有着“出色的判断和必不可少的敏锐”,但认为她应当更多地注意一下恩格斯本人的情况而不光是

^① Marianne Weber, *Ehefrau und Mutter in der Rechtsentwicklung. Eine Einführung* (Tübingen: Mohr, 1907), repr. Allen: Scientia Verlag, 1971, p. 495f.